

东罗马皇帝莫里斯和突厥可汗： 泰奥菲拉克特·西摩卡塔所记突厥史料^①

[法] 魏义天 著 赵飞宇 译 马翊斐 审校

内容提要：泰奥菲拉克特·西摩卡塔关于突厥人和中国的记录是现存拜占庭文献中对远东记载最为详备的文本。曾有一个有关突厥—拜占庭双边政治背景的假说，其推断来源则是：和莫里斯通信的不知名可汗就是达头，泰奥菲拉克特·西摩卡塔还引用其国书，他是突厥汗国开国君主的侄子，在很长时期内（576~600年）出任西突厥地区统帅，随后成为整个汗国的大可汗（600~603年）。把泰奥菲拉克特著作节选提到的事件从598年重新断代到595年，并且依据从中国新疆昭苏县发现的粟特铭文，则很显然和莫里斯通信的人不是达头，而是泥利可汗，595年泥利自称是最高可汗并且控制天山北部。泥利也是6世纪末分裂突厥汗国的王朝战事中的重要人物之一，而那时达头从官面上还只是他的下属。

关键词：达头可汗 泥利可汗 突厥石人 西突厥 莫里斯

中图分类号：K2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743（2018）02—0091—04

DOI:10.16363/j.cnki.xyyj.2018.02.008

拜占庭史学家泰奥菲拉克特·西摩卡塔（Théophylacte Simocatta）在《历史》（*Histoire*）一书中提到，595年，突厥可汗的一封信送达了东罗马皇帝莫里斯（Maurice）（582~602年在位）的宫廷：

今年夏初，东突厥以可汗之名向莫里斯皇帝派遣使臣。他拟写了一封国书，在信中炫耀胜利。信件开头部分如下：“大可汗、七姓大首领和世界七国主致罗马皇帝迺启者。”^②

泰奥菲拉克特·西摩卡塔随之释读信函中包含的信息并提出自己的阐释。这段节选记叙突厥汗国的诞生以及它和中国的联系，可以被看作是13世纪罗马教皇使节记载之前基督教史料对远东的最详细的一次描述了。它充分吸引了东方学家和拜占庭学家的目光。豪西克（Walter Haus-

① 本论文原题目为 *Maurice et le Qaghan: À Propos de la Digression de Théophylacte Simocatta Sur Les Turcs*，以法文发表于《拜占庭研究》（*Revue des Études Byzantines*）第68卷，2010年，第219~224页。感谢魏义天（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教授及《拜占庭研究》编辑部授权笔者翻译此文。

② Théophylacte Simocatta, *Histoire*, éd. C. De Boor, corr. P. Wirth, 斯图加特, 1972年, 第256~257页。我再次感谢祖克曼（C. Zuckerman）欣然校对了这段翻译，译文基于惠特比：《泰奥菲拉克特·西摩卡塔的历史》（M. et M. Whitby, *The History of Theophylact Simocatta*），牛津, 1986年, 第188页。

sig) 此后发表了一篇长文,这篇发表在1953年的《拜占庭期刊》^① (*Byzantion*) 上的文章提出的问题相当复杂。本篇只为确认书信的作者,而泰奥菲拉克特没有指出其具体姓名:派遣使臣前往莫里斯王朝的可汗是哪一位,是谁如此飞扬跋扈地宣称是七姓大首领和世界七国主?

官修历史文献倾向于考虑汉文文献的达头可汗,他是汗国缔造者的侄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576~600年)担任汗国西部疆域的统治者,之后成为整个汗国的大可汗(600~603年在位),他也在拜占庭文献中赫赫有名,按照曼南德尔^② (*Ménandre Protecteur*) 的记叙,就是他在576年接见了提比里乌斯皇帝(*Tibérius César*) 派遣的使节。汉文文献着重指出自580年起他的权势膨胀,已经超过当时名义上的大可汗,故而,他是与莫里斯通信的不二人选。^③

此事非同小可,两个平行呼应的发现给可汗的身份鉴别提出了一个新的推论。从拜占庭角度,泰奥菲拉克特的编年问题似乎迎刃而解。多数对可汗身份感兴趣的东方学家,也得以在19世纪草创其编年体系,尤其是爱德华·沙畹(*Édouard Chavannes*),他关于西突厥的研究成果,在其出版后一个世纪依然难有望其项背者。他们推定泰奥菲拉克特在文中随笔记载的事件,发生的时间正是598年。^④ 不过现在我们将事件年代推定于595年,个中原因复杂,主要牵扯到巴尔干地区的一系列历史事件,故此处我们不作赘述。^⑤ 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复杂原因全部和我们探讨的文本无关。598年这一年份确实不和任何突厥历史的重要事件相关联,注释者们力图为这个年代正名:豪西克以泰奥菲拉克特的年代模棱两可为由,断言后者写了一个随意的日期,而此信是公元600年送出的,正是此时达头真正宣称自己是大可汗,可实际上580年起事实上就已经如此了。^⑥ 他更相信书信中提及的有关突厥政治变迁的部分,如汉文文献记载,在581~582年,很多大可汗宝座觊觎者同时宣称自己才是真命天子。这许多称王称霸之人也使得书信内容显得不那么够份量了:除了“今年夏初”这个年代细节有问题,连文中内部逻辑都不应参考,按照此逻辑,发信是因为战胜了一个对手:“可汗以使者为媒介向莫里斯皇帝大炫武功。”^⑦ 全文最终落脚于这次胜利以及与中国的后续协定,我们无法推断为什么达头会蛰伏二十年才知会拜占庭这些事情,而对这其间王国的风云变化和他的权力起落只字不提。沙畹认同年代在598年,但说此信是预告莫里斯说自己在公元600年掌权,就显得不太可能了。^⑧

确实有几条证据使得我们质疑发信日期和发信者身份。然而,我们却难以找到另一个使人信

① 豪西克:《泰奥菲拉克特关于斯堪特民族研究的附记》(*H. W. Haussig, Theophylakts Exkurs über die skythischen Völker*),《拜占庭期刊》,第23期,1953年,第275~436页。

② 曼南德尔:《历史》,编辑和翻译:布洛克里,《曼南德尔卫兵的历史》(*Ménandre Protecteur, Histoire, éd. et trad. R. C. Blockley, The History of Menander the Guardsman*),利物浦,1985年,第179页。

③ 关于达头的生平,参见沙畹:《西突厥史料》(*É. Chavannes, 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 (Turcs) Occidentaux*),巴黎,1903年,第48~51页注释5。

④ 参见布里:《泰奥菲拉克特的年代学》(*J. B. Bury, The Chronology of Theophylaktos Simokatta*),《英语历史评论3》(*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3*),1888年,第312页。

⑤ 这一问题的详细介绍参见惠比特:《莫里斯皇帝和他的历史学家:泰奥菲拉克特·西摩卡特所记波斯和巴尔干战争》(*M. Whitby, The Emperor Maurice and his Historian: Theophylact Simocatta on Persian and Balkan Warfare*),牛津,1988年。讨论突厥问题的地名见第315~317页。

⑥ 豪西克:《泰奥菲拉克特关于斯堪特民族研究的附记》,第376~384页。

⑦ 泰奥菲拉克特·西摩卡特:《历史》,第259页。

⑧ 沙畹:《西突厥史料》,第245~251页。

服的体系，故而现在的评论人一般都赞成豪西克的意见，但会有所保留。

所有这些推论在一段粟特铭文被解读后都被推翻了——粟特语是当时中亚地区的通用语，这使得解决所有年代学问题和提出更有说服力的论点成为可能。^① 1953年曾经发现一座突厥样式的石人像，位于中国和哈萨克斯坦边界的不远处，在新疆伊犁昭苏县附近（坐标 43°7′18.56″N；81°11′27.25″E，海拔 1790 米）。当地牧民称其为蒙古库热，亦或在汉文史籍里叫做小洪纳海。石人像属于陵园的一部分，陵园内保存着一些考古遗迹。^② 这是一个突厥贵族的形象，做工略粗糙，在石像下身有一段铭文，1978 年才被确认为粟特文，1990 年第一次由伊朗学家识读。铭文还未完全公开。不过，一处关键点已经解读：在 6 行和 7 行，铭文宣称泥利可汗继任大可汗，他是木杆可汗（552~572 年在位）的孙子，木杆可汗传位给他。

铭文内容如下：

6. mwx' n x' γ' n npyšn βγγ (Čwr) -p' y nry x' γ' n

可解读为：木杆可汗的孙子，泥利领主

7. pr x (r) γwšk srđw mz' yx x' γ' n n' (y s) ty

可解读为：兔年坐上大可汗的宝座^③

铭文垂直阴刻在双手之下的圆柱体部位。

事件的断代依据十二生肖体系，它在中原和突厥都通行。这次登基发生在兔年，即 571 年、583 年、595 年或 607 年。泥利可汗在汉文文献中有记载，却以泥利之名^④：他在 588 年被首次提及，其父是 581~582 年事件中大可汗宝座的觊觎者之一，史料正是记载其父之死时提及了泥利可汗之名。后者应是 599 年或 604 年去世（汉文文献对此记载相互矛盾，但是随着铭文指出这座雕像是在泥利可汗的陵园为纪念泥利可汗而建，我们可以确定 604 年才是真正的年代）。泥利可汗在 595 年自立为汗，这是此间唯一的兔年，而达头 600 年才荣登可汗之位，按时间上是排在第三位，此前的都蓝自从 588 年就已成为可汗。因而，极有可能泥利可汗才是与莫里斯皇帝的通信人，也是他向后者发出自己继任大可汗之位的信息。

此外信件涉及到的政治事件也都可以联系到 6 世纪 90 年代的历史背景。581~582 年，就如豪西克已经指出的那样，在复杂的旁支继承传统（兄终弟及）混合着聚落首领选举的背景中，

① 关于粟特人和他们作为草原使者的角色，尤其在拜占庭统治时期的情况，参见魏义天《粟特商人史》（É. De La Vaissière, *Histoire des marchands sogdiens*），巴黎，2004 年，第 204~231 页。

② 林梅村：《小洪纳海突厥可汗陵园调查记》，收入魏义天，童丕主编：《粟特人在中国》，巴黎，2005 年，第 317 页~396 页。另参见大泽孝（Takashi Ôsawa）对这处铭文所做的历史阐释，《古代突厥和粟特关系考——以新疆一尊带有粟特铭文的石雕为中心》（*Aspec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ncient Turks and the Sogdians—Based on a Stone Statue with Sogdian Inscription in Xinjiang*），收入《庆祝马尔沙克先生 70 华诞文集》（*Ērān ud Anērān. Studies presented to Boris Il' iČ Maršak on the Occasion of His 70th Birthday*），主编：康马泰（M. Compareti）、P. Raffetta、G. Scarcia，威尼斯，2006 年，第 471~504 页。我不赞同大泽孝教授阐发的一些观点，尤其是关于石人像的建造年代问题。

③ 我向吉田丰教授（Yutaka Yoshida）和辛姆斯·威廉姆斯教授（Nicholas Sims-Williams）再次表达诚挚的谢意，他们慷慨地为我释读有关文字。在此我使用了他们的释读，尤其 x' γ' n n' (y s) ty “坐（在王座上的）可汗”，反映了突厥语 qayan olor-“统治”。参见吉田丰：《突厥—粟特特征》（*Turco-Sogdian Features*），收入《辛姆斯·威廉姆斯纪念文集》，主编：宗德曼、辛采、布洛瓦（*Exegisti monumenta. Festschrift in Honour of Nicholas Sims-Williams*, éd. W. Sundermann, A. Hintze, F. De Blois），威斯巴登，2009 年，第 573 页。

④ 此处原文使用拉丁文转写 Nili，而前文使用法文 Niri。——译者注

突厥王位继承引发的巨大纷争已经开始了。汗国缔造者布民可汗的三个表兄、孙子反目成仇，他们的不和导致分裂出两个对立的汗国，且都企图成为汗国的合法政权。年长的东突厥一支在阿尔泰山区和蒙古高地安营扎寨，亦是阿史那汗国之滥觞：沙钵略可汗581年夺取政权，587年去世；之后他的兄弟处罗侯即位，到588年去世，其子后来即位成为都蓝可汗（588~599年在位），再之后则是他的侄子突利可汗（599~608年在位）了。西突厥，年幼的一支托庇于达头可汗帐下：首先是大逻便（阿波可汗），与之（沙钵略）分庭抗礼，583年到588年在位；其后他的侄儿泥利可汗（588~604年在位），然后是泥利的儿子达漫（604~610年在位，619年在中原去世）。最后是达头，布门可汗之弟室点密的儿子，分裂出第三支势力，一般排除在大可汗之外，因为室点密从未在汗国执政，但是在西部地区势力很大。^①

给莫里斯去信的原作者就陈述了他的胜利：

而可汗凯旋而归，突厥却迎来了一场内战。一个叫 Turum 与可汗有亲缘关系的人，他兴兵造反且势力日益壮大。当篡权者在鏖战中处于上风，可汗派遣一名使臣向另外三位大可汗（求援）。这是他们的名字：Sparzeugun、Kunaxolan、Tuldich。在所有人聚集到伊卡尔（这是大平原中部的一个地区）之后，他们的敌人相聚在此激烈厮杀，篡权者阵亡，他的同盟丢盔弃甲落荒而逃；在经历一场大屠杀之后，可汗重新收复失地。可汗通过使节向莫里斯皇帝传递了胜利的境况。^②

篡权者的名字 Turum，令人想起595年西突厥的首领，泥利当时的对头：他叫都蓝，已经在《中古中国》（*Early Middle Chinese*）上有所介绍，*Toran 和 Turum 非常接近，尽管突厥语、汉语和希腊语是如此不同，我们还是无法通过音译将二者的后鼻音区分开来。而文章中提到的另一位可汗的身份可以确认：Tuldich 确实就是汉文文献中的突利，汗国北部可汗（汉文文献中第一次提到他也是在593~596年之间），而他的名字发音为 *Tulih。^③ 只有敌对可汗的死讯是无中生有的，毫无疑问，此举是让拜占庭盟友放心泥利可汗继承大统：都蓝四年后死于暗杀。

关于泥利我们知之甚少。他的陵冢位于特克斯河谷，在天山和阿尔泰山之间一处水草丰沛的广阔牧区的西南部，汉文史料语焉不详，但还好提到寥寥数笔。中国史家对其生平实在太吝笔墨：他们记载了他588年继承父亲的王位，他的一位妃子是汉人，他和都蓝身边一位失势的中国公主有密谋，公主死于后者之手。大概600年他和他的王储被铁勒部落的叛军击败，于604年与世长辞。这就是有关他的全部记载了。^④ 引自泰奥菲拉克特著述的信件着实完全颠覆、刷新了我们对他统治时期的看法：虽然中文文献没有提及，但他确实立志攫取整个突厥王权，即使达头当时是西突厥之首。这次汗国巅峰的决裂可以解释为何在泥利继承部落首领之位一年后西突厥军队兵力大减：589年，突厥失去克里米亚（la Crimée）和黑海沿岸，拜占庭帝国遂又占据此地。同年他们在赫拉特同巴赫拉姆·楚宾（Bahram Chubin）将军率领的萨珊王朝军队对决时败北。大家经常猜测达头可汗才是始作俑者。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还不确定：泥利和达头的确切关系没有任何史料佐证，泥利在信中对这位对手避而不谈。我们仅仅知道，599~600年（下转第147页）

① 关于人名，参见刘茂才（Liu Mau-Tsai）的索引，《有关中国研究东突厥史的信息》（*Die chinesischen Nachrichten zur Geschichte der Ost-Türken (Tü-küe)*），威斯巴登，1958。同时参见沙畹的索引，《西突厥史料》。

② 泰奥菲拉克特·西摩卡塔：《历史》，第259页。

③ 突厥名字的拜占庭注释中 d/y 常常交替使用，因此 Yaiq 也叫 Daikh。

④ 刘茂才：《有关中国研究东突厥史的信息》，第57、61页；沙畹：《西突厥史料》，第14页。

副所长李文瑛研究员勾勒新疆两汉时期纺织的发展脉络，新疆社会科学院殷晴研究员从于阗、鄯善的经贸发展与文化转型的角度讨论了汉晋时期西域南道的演变，中央民族大学博物馆馆长张铭心教授重点指出河西文化对吐鲁番的影响，北京联合大学陈悦新教授探讨了龟兹佛衣上体现的东西文化交融。

部分学者侧重讨论新疆汉以前的文化面貌。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丛德新研究员分析阐述了塔里木盆地北沿早期考古学文化与丝绸之路的历史联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韦正教授对库库坦尼文化作了分析，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副院长马健副教授讨论了东天山早期聚落形态。

建设部综合勘察研究院遥感制图中心郑书民主任从科技支撑的角度，介绍了大遗址数字化保护的方法。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辉教授、林梅村教授、陕西考古研究院原院长焦南峰研究员、国家博物馆杨林研究员等也作了精彩发言。

本次研讨会多角度揭示了历史上中央政府对新疆的有效治理和中华文化在新疆的主导地位，并对倍受关注的西域都护府遗址将来的考古工作寄予了厚望。与会专家呼吁尽快开展考古和保护工作，并将其建设成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充分加以展示利用，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厅党组书记任华同志出席了开幕式。任华同志在开幕式致词中指出，以两汉西域都护府、魏晋西域长史府、唐安西大都护府为核心的一大批古代遗址是中央政府治理新疆的历史明证，是国家主权的重要标志，是文化认同的关键地标，是中华民族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深入探讨和挖掘这些遗址的历史文化价值，对于“五个认同”，对于正确阐明新疆“三史”，对于新疆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责任编辑：王文洲 责任校对：李文博

（上接第94页）达头一方面利用泥利镇压铁勒的失利，另一方面利用都蓝的死亡，企图夺取大可汗之位，他如此侵犯泥利的权利，正如泥利致莫里斯的书信表达的那样。反过来，595年的声明也恰恰表明，面对达头这个过于强大的对手，泥利最终也失去了对他的掌控。

不论如何，撇开推论，可以确定的是一个可汗王位的合法继承人在595年宣布接手对中亚的统辖，而同年夏天，莫里斯接见了一批某突厥可汗的使节。该可汗明确地自称是七姓大首领、世界七国主，就像在他之前的大可汗所做的那样。我们很难不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我们也发现了几个无法考释的人名。但这段索隐也确实构成了解读泰奥菲拉克特所著拜占庭巴尔干战争编年史的有力外部证据。

（作者 魏义天系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院（EHESS）教授；

译者 赵飞宇系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彭杰 责任校对：李文博